

（二〇一五年七月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文献资料】	九届二中全会日记	解学恭
【荒唐岁月】	我的“文革”岁月之红歌与忠字舞	黎劲风
【亡灵祭坛】	“迷糊”之貌 清澈之心——怀念谢晋澄同学	但 粦等
【往事非烟】	“小三家村”事件——清华园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冤案	刘守昭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文献资料】

九届二中全会日记

• 解学恭 •

〔原整理者按：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林彪等人在会上通过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办法，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订的《论天才》的材料，授意华北组编写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反革命简报”的全会“六号简报”）。8月31日，毛泽东公布了《我的一点意见》，指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会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解学恭是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同时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军区省委常委、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华北组副组长，与李雪峰、吴德一起签发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为此，解学恭在会议期间做了检讨，并揭发了陈伯达在天津的活动。当年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解学恭在会上多次检讨。为了贯彻华北会议精神，1971年2月，天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天津警备区党委联合召开500余领导干部参加的批陈整风会议，解学恭在会上做检讨，接受与会者批评。笔者作为天津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整理解学恭日记时，笔者发现了他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日记，较为全面地记录了会议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华北组讨论的详情，是一份比较难得的史料。其中提到的人物以及日记对他们的评价，只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认识。——王辉）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八日

上午七时十分随同蔡树梅（注1）、张福恒（注2）同志赴庐山开会。

途中在石家庄稍停，同山西、河北同志换乘大飞机到武汉，又换小飞机到九江，坐车上山，二时抵庐山。

八月十九日

游览仙人洞、险峰、花径、鹿苑、含鄱口、植物园，看世界稀有植物水杉。

八月二十日

游览黄龙寺、玉龙潭、三宝树、水电站、圆佛殿、大天池、八卦塔、望江崖。望江崖有阳明山人王守仁字迹刻于石。

晚九时三十分至十一时许，陈伯达同志约谈话，同车去的有赵成章（注3）同志。谈的问题：

一、坨子地（注4）那个富农分子写的变天账印出来了没有，最好能快印。已告排版，尚未印。

二、在天津谈话流传一个十一条不知出自何处。是不是天津出来的。伯达同志给我一份打印十一条看，我说不是天津出来的，天津没有这个十一条。陈要我问余秋里同志，是否他那里出来的。这个十一条是业务组一个工作人员给的，可能是从计委出来的。流传的这个十一条，有些语言错误，编排较乱。秘书已告刘政同志（注5）改正。这个十一条再不要扩散了。

三、关于华北经济协作问题。经济协作很必要，华北条件好可先行一步。你告诉雪峰（注6）、郑维山同志（注7），在这里可以和华北各省市同志碰碰头，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告，总理有指示，北京牵头，正在准备。你还是告诉郑、李一下。

四、学习西右营（注8）问题。我反映，学习英雄的西右营口号传出后，干部群众有反映。伯达同志说，要各大队互相学习。突出西右营会帮倒忙。西右营同反动的政法公社（注9）斗争，是英勇的，对天津文化大革命有影响，从这点说向英雄的西右营学习是可以的。但这是指西右营的贫下中农。宣传过火了，西右营会垮台的。要注意。

五、在西右营可以试试商业由大队来办。国家办，一个售货员一个月拿三十元，脱离群众，贫下中农有意见。你们可不可以试试？

六、公社干部有的一月一百元工资，太高了，生活同贫下中农悬殊太大，家属又不劳动，这个问题是防修的问题、产生官僚主义的问题，应考虑一下，怎么办好。

七、我说十一条中，天津粮食是要自给，办不到，仅有170万亩粮田，等于一个县，包不起300万人口的城市。陈伯达同志带着批评的口吻说，你们天津落后就是没有雄心壮志；还有国营农场问题。每年国家拿3亿元补贴，这是一个问题。天津的国营场是否可以自力更生，搞集体核算，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们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八月廿一日

郑维山同志传达：

林副主席要华北把战备问题，在三五日内写个情况送给林副主席办公室。战备怎么搞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经验，今后怎么搞，对全面战备怎么搞。文字不通不要紧，内容不全、材料不全不要紧。是资料性的，阅毕以后还退还你们。

郑要我帮助写。

我向李、郑报告了陈伯达同志要华北同志碰碰头，研究一下，经济协作区问题。李说，不能开。又谈具体组织写战备材料问题，先由两个秘书写，我们再改。

中午，余秋里同志来，我们顺便问十一条是不是你们那里搞出来的，余说根本不知道。下午给伯达写了一封信，反映天津粮食不能自给，请再考虑。

八月廿二日

晚九时半，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总理主持。

总理传达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

总理说，一、开一个全会，大家都出席。二、全会议程三个：修改宪法，国民经济提纲，战备工作。主席说，廿三日到廿九日时间差不多了，会议可以结束。主席认为第一件事比较容易。第二议题是国民经济计划，当读到执行情况很好时，主席讲，让它超过。因此，计划没有大改。廿三、廿四、廿五日，政治局讨论计划。第三个议题，军委办事组起草了一个文件，送林副主席审阅后再提交政治局。

此外，人大代表名额还要谈一下。中央决定，爱国人士为特邀代表，共104人。

会分六个组，按原来的分组法，政治局的、中央部门的、军队的，分别参加到六个组中去。

主席说，大家关心的是形势，总理讲一下。

康老解释宪法讨论后的修改稿的各要点。

总理说，大家都希望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做国家副主席，这是群众的热望。

主席说，不要设国家主席了，党领导国家，主席是个形式。资产阶级国家也是他那个党做决定、国会通过。接见外宾，规定了不好办，不规定就可以见、可以不见。政协存在不存在，看一看。

又讨论到公民的年龄问题。十六岁小，判断力差，对早婚有影响；在法律上对成年未成年还是有区别的。

汪东兴同志补充传达主席指示：

大家关心的是形势问题。主席指示由总理讲；宪法由康老讲。

林副主席说，主席决定把宪法交给群众讨论，积极性高了。主席说，过去讲企业下放，调动积极性，可是没有摸底就下放了，这次下放有底了。有两年工业下降，这两年又上升了。南粮北运、北煤南运的问题，现在煤逐步解决了。主席说，看依靠谁？靠专家、还是靠群众。林副主席讲，主要是发动全国亿万群众的积极性。

当康老讲到宪法全国讨论了，党委建立问题要解决。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两个办法都可。

主席说，整党不是开始了吗？吐故怎么样？吐的不多吧。康老讲挂起来的多，主席说，那就吐故不多了。

总理讲，主席指示下放，一要落实，二不要许愿太多。主席说的两个办法，实际上是两条路线，是依靠专家还是依靠群众的问题。

起草委员会如果同意宪法草稿，可以发到全会同志讨论。

八月廿三日

上午：阅读文件。

下午：四时三十分至六时，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主席主持会议，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总理、康老讲了话，伯达未发言。

晚八时至十一时，小组讨论林副主席报告。林副主席讲话讲得很深刻，从历史发展阐述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胜利的根本。每到紧要关头，都是毛主席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思想迷迷糊糊，要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为自觉的思想。切合实际、有的放矢，对提高全党的路线觉悟意义深远。

十二时至下午三时，整理林副主席讲话的笔记。

八月廿四日

上午听林副主席报告录音共两遍，边听边核对记录，又加深了印象和理解。

下午三时至六时，小组讨论林副主席报告。中央办公厅通知廿四日、廿五日两天讨论林副主席报告。当日下午陈伯达同志在华北小组发了言。汪东兴同志也发了言。伯达同志的发言有稿子，李雪峰同志翻译，伯达同志发言，着重阐述林副主席报告中有关毛主席是伟大天才的论述，把天才问题搞得非常高，引证了许多语录，有时加以解释。汪东兴同志发言着重讲国家应当设主席，并且对这个问题提得很高。陈伯达同志为这个问题不时插话，帮助提高。小组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情绪激昂，上纲、上线很多很高。陈毅以极左的面貌发了言，大意是：现在竟然有这样狂妄的极端的反革命分子搞阴谋，要揪出来，坚决打倒。我虽是犯错误的人，但我绝对不能躲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连个狗屁也不敢放！声称我要参加这个战斗，斗到底。他的发言，引起同志们的反击，指出他的立场不对，言不由衷。其他同志的发言也很激动，十分气愤，但基本属于表态性的。对设国家主席问题，会场鼓了几次掌。李雪峰同志主持会议，未发言。

六时休会，李雪峰留下几个副组长，对秘书说，今天是大事，简报要快出，综合、如实反映。

晚上八时至十一时，小组继续讨论，和下午差不多。晚十二时，晚餐时黄道霞（注10）同志催要简报签发。李签了字。我觉得帽子太多，李说中央会议，有闻必录，如实反映。我说，陈毅同其他同志并列一起不好，李、吴说勾出来，我勾了出来，写了一句，其他未动。李说赶快拿去发吧，我签了字，吴德同志也签了字。

八月廿五日

上午阅读文件。

下午继续小组讨论。吴德同志主持会议。我表态发言后即去修改向林副主席报告华北战备情况的材料。

近六时，雪峰同志从政治局开会回来，宣布了小组会立即停止，向几个副组长传达了三条指示：一是会议方向不对；二是那么上纲上线不对，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三是林副主席的报告是讲思想的。别的都不准传达。

九时，吴德同志电话传达三点，向骨干说一下：

- 一、国家不设主席是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意见；
- 二、有的同志有错误思想，可以批评；
- 三、不能揪人。

其他的问题，听候中央政治局统一讲法。

又通知：廿六日休会一天，晚上看电影。

八月廿六日

清晨，中央办公厅王良恩（注11）同志电话传达三点指示，向骨干讲明三点：

- 一、国家不设主席，这个问题不要再提意见了。
- 二、林副主席的报告是讲思想的。
- 三、不许揪人。

八月廿七日

上午八时半，雪峰同志传达国家不设主席的问题，要向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打招呼，做细致的工作，打通思想，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工作要做到一个人不漏，而且要做通。

学习林副主席报告，使每个同志提高认识，理解这个报告的精神是讲思想的。

各省市参加会议的同志讨论宪法草案，并修改一本送交大组，大组综合一本送中央。

九时半至十一时半，小组学习林副主席报告，一致认为：

一、林副主席的报告精神，是使全体同志认清毛主席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要坚定、要清醒，要学习再学习，要代代传下去。要谨慎，上面一股风，下边就可能变样子。

二、报告对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宪法稿，是肯定的、满意的，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针；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宪法产生的方法是体现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都是正确的。

三、报告讲的是思想问题，针对一种思潮讲的，不是指的什么人。针对性是包括自己在内，作为革命的动力和对象。

下午三时至五时半，天津小组对宪法草案提修改意见，共四点：

1、序言中可否加上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注（12）的第一段。

2、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前加上国家二字。

3、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按林副主席报告，是否可再加上“和领导者”四个字。

4、“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提议改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提法有问题，可以不提）

其他都同意。

八月廿八日

上午休息，到仙人洞，同郑三生同志（注13）、吴德、吴忠（注14）等同志摄影留念。

下午学习。

八月廿九日

上午十时三十分至十二时半，华北地区小组负责人开会，主要是听汪东兴同志发言检讨。汪东兴同志讲，他请示了主席，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的十位同志是主席指定的。他到这个会上来讲，也是主席同意的。汪东兴同志检讨自己的错误，违背了主席教导，犯了错误，完全同意主席对他的严厉批评，说“我是一个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的人，犯了这么个错误。

下午四时，雪峰同志召集华北组负责人开会，传达总理指示。大意是，四时半，林副主席要主持一个会，参加人政治局同志及各大组正副组长，主要解决这次会议中发生的问题。听几位同志的发言，统一表态，完全拥护毛主席指示，坚决照办，保证把这次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让毛主席安心，让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心。

四时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七时四十分结束。林副主席主持会议，总理、康老发了言。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六个大组组长表了态，春桥同志也表了态。会议空气好，团结胜利的会。决定将这次会议的全部用录音向参加全会的同志传达，并规定不记录，严格保密。

八月三十日

上午八时半到十二时，小组同志听录音传达。

下午有的同志二次听录音传达，有的同志自学，宣布可以自由选择。

回忆李雪峰同志在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时，有几句插话，据说是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时用的：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孙权小儿，想把我置于炉火上烤。”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提起千斤，放下四两。”

“孔夫子打牌，和为贵。”

“情况不明，决心很大，心中无数，方法不对。”

庐山的这场斗争，真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教训实在深刻。

听主席的话，按主席的指示办。不能只讲，必须坚定地如实地执行，绝对不能含糊。一言一行，要考虑到党、全局、方向、纪律。

要时刻警惕坏人。赞扬就可能是坏事的开始。听到赞扬声，就要警惕自己。

凡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必须坚决顶，坚决斗，不能有私心杂念。

没有调查、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就不要随便表态。

什么是谦虚？实事求是态度就是谦虚态度。谦虚与虚伪是排斥的，格格不入的。

领袖与群众是心连心的。对立起来看问题就错了。毛主席的指示，是代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主席指示国家不设主席，出发点在此。

陈伯达是个野心家、骗子。欺骗蒙蔽了多少人！教训深切！

八月三十一日

通知可以外出。上午，同北京、天津的同志到五老峰游览。听说五老峰最高，很难上到主峰。我们登至三峰，十分疲劳。心脏有痛的反应，休息了一阵，过午返回。这天到五老峰的人真不少，有华东、东北、西北的许多同志。

九月一日

上午：休息，不外出。

下午四时半至晚十二时，林副主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月三十一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字字闪耀着马列主义的光辉。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极为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揭露了陈伯达分裂党的大阴谋和狂妄的野心，使这个假马克思主义者原形毕露。

九月二日

上午，分省开小组会，讨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会上我发了言，并揭发了陈在天津的两面派活动事例。

下午三时至四时半，继续讨论。

四时半至七时，林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扩大）。黄总长讲战备情况和战备工作。

晚，八时半至十一时，康老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逐条修改通过宪法草案，一致通过修改意见。

九月三日

上午：继续分省讨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我们重点讨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个根本区别问题，掌握武器，批判陈伯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下午：三时至七时，华北小组开会，讨论主席指示。总理、康老参加了会议。陈伯达到了会。根据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所谓检讨和一封寥寥数行的“表白”信，进行了批判。这次会上我发了言，主要点：

- 1、对主席指示的理解，检讨自己上当的教训；
- 2、批判陈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分裂党的罪行；
- 3、指出陈伯达的检讨，极不深刻，很不像样子，而且埋下了不少翻案的“钉子”，如第五条……；

- 4、陈伯达态度很坏，不改正就彻底完蛋。这决定于陈自己。

其他同志也发了言。

总理、康老插话、发言。

总理：要读书。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不然就上当。

康老：受骗问题，主席说，第一，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深思一下主席的话，每句话都闪烁着马列主义的光辉。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这三条为什么就受了骗？

永胜：不学习，就不自觉，就盲目、就受骗。

总理：陈伯达是靠刘怕邓。上过当不要紧，把自己摆进去，学习、提高。

康老：陈在华北组煽风点火，有五大谎言：

一、宪法上写上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你说是反复斗争的结果，这真是弥天大谎。你只参加过两次会，没有讲这个问题，你讲什么两种所有制，不要留尾巴……

二、你说有人说毛主席天才，是一种讽刺，你是害人，用心真恶毒。

三、你煽动说是要否定十一中全会公报，为刘少奇翻案。

四、你说利用“毛主席的谦虚”，你是贬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造毛主席的谣。

五、你说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谁怀疑？竟然有人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是谁？这完全是煽动！

煽风点火，完全是有组织有准备的。你事先就把造好的语录送给人，并且还打了电话。

陈伯达有三大罪恶：

一、分裂党，要夺权，为了这个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二、打着假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欺骗同志。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三、不仅反对毛主席，而且辱骂毛主席。你的话音刚落，陈毅就拥护，而且讲了很恶毒的话，你没有任何表示；你说是起草的人是反革命，听到不设国家主席就手舞足蹈，你把政治局、起草委员会、起草小组都骂成是反革命。

你真是一个一手拿着鸦片烟、一手拿着刀，一面毒害同志，一面要把人送上断头台，你口口声声讲，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实际是大大的“政治家”，搞阴谋的政治家。

你是个假马克思主义。一，你不引马克思的话，恐怕引，又欺骗同志。二，引恩格斯一句话，欺骗同志，恩格斯讲过这句话，但接着说，马克思深刻研究了法国的历史，研究了法国的阶级斗争，收集研究了许多资料，才成为一个天才的著作。而且这部书是马克思34岁时写的，青年时代的著作。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才写序言的。这点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断章取义，欺骗同志？你引的列宁的五条，列宁是批评蒲鲁东派，说他们的领导人是革命高潮中进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引证全，就会引到自己身上，所以你不引全。列宁批评的正像你这样没有改造的旧文人、旧知识分子。陈伯达既然来个突然袭击，我们就不能来个草草收兵。

作为教训，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接受教训。

总理：主席说，八月“顺流”同“二月逆流”合流，二陈合流。

总理、康老讲话，对自己很受启发和教育。受骗是什么原因，教训是什么？只有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在实践中用，时刻用，才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有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才能减少盲目性、不受骗、不上当。

九月四日

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揭批陈伯达反党罪行。

下午三时到六时，晚八时到十一时，小组讨论，揭发批判，发言同志十分热烈。对陈的检讨极不满意，并纷纷提出质问要陈伯达回答，陈态度抵赖，不发言，“想一想”……

雪峰同志传达，小组会到此告一段落，明日有新的安排。

九月五日

上午阅读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李雪峰向小组同志传达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一开始问：会议可以结束了吧？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底细，知道较多的是总理、康老和我。这种事总是会有，庐山不太平，别的地区就太平了吗？比如陈毅当中央委员，有多少人反对啊，说服就当选了嘛！

会上康老集中反映大家的四条要求：

一是普查陈伯达的历史，过去有人写过检举信；

二是要他彻底交代；

三是要他写出来，免得他赖账、诡辩；

四是不能留在主席身边。

主席说，到别处也是一样，文人难改造。

有人说他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时，主席说，能写些文章还是鲁迅说的那些人。五四运动以来，有的死掉了，有很多人都不行，我就不相信红卫兵那些领导人都行吗？

大家讲到我们党的时候，戴季陶、邵力子发起建党，但很快就退了党，所以我们这个党历来就是复杂的。如一次大会后，就有陈公博、周佛海当了汉奸，并不影响我们党光荣伟大。又如刘仁静，这样的人关他干什么。罗章龙这些人也不要抓他，无非是跑到了土耳其，搞也搞不出什么油水来。苏联的波格丹诺夫、马尔托夫，开始保下来，后来斯大林就杀人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杀了。

当问到陈伯达该怎么处理时，明天开大会他上台不？大家说不要上台。毛主席又问要不要到会？大家说，不要到会，免得大家生气。主席说，如果历史上查不出什么事，我的意见还应保留中央委员。比如陈毅还当中央委员嘛？！这种人不可不有，不可多有。

有的同志说，他回到北京时要限制一下自由，他到处跑，有事找不到他，他行动从来不打招呼。

主席问，公报写得怎么样？主席说，大会是个形式，不可不开，还是小组会能谈些东西。

主席问，怎么传达？总理说，是否可以带回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陈的检讨两件，共三个文件。在核心小组、军区党委常委、军党委常委传达。有人说不好保密。总理又说，保密问题可以谈通，也是可以做到的。主席说，要有步骤，大家议一下，何必那么忙呢？

九月五日下午分小组讨论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指示。五时至八时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宪法草案、全会公报。林副主席主持会议。一一通过，一致通过。

九月六日

上午大组会，通过三个文件。



十一时半，总理、康老召集大组正副组长开会，讲了几个问题：

1、传达范围、内容，规定省市核心小组、省军区、军党委常委、大区常委。内容以“我的一点意见”为准。

2、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一是要保证做到不泄密。所有大小会议的记录，一律交中央封存，个人记录、摘抄等一字不留，全部销毁，所有文件一律收回。

3、团结至为重要。

4、对陈暂不作组织处理。

5、要读几本马列主义书。康老讲：可以读读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叛徒考茨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

上述内容向小组传达了。个人记录一律由几个秘书登记，集体监督销毁。

下午，五时至六时，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会议，林副主席主持会议，总理、康老讲话。

一、一致通过三个文件。

二、总理讲话。重点讲国际国内形势大好，党内发生波折不足为怪。要坚持团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康老讲话。主要讲学习问题。要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要学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偏向，一是只认为马列主义的书是经典著作，贬低毛主席著作；一是只读毛主席的书，认为马列书可以不读了。这两种偏向的共同点，是把马列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都是不对的。讲到受假马克思主义者欺骗的教训，没有马列主义认识不行，因此多读一些书是必需的。

在康老讲话过程中，主席有两次插话。“三十本书是我提倡的，不是什么阴谋，是不是要搞三十本，这不是我搞的，这是他们搞的。我看搞多了一点。要学一点马列书，不学就会受骗。”“炸平庐山，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晚八时，有人送来两个材料，一个是学哲学的情况，一个是要天津查一查帅孟奇（注15）和什么人有什么联系没有？帅是叛徒，可能同天津的一些人有联系，查清后把情况告他。

九月七日

九时下庐山。十二时由九江起飞，到安庆转机，二时四十分到石家庄。天雨太大，不能再飞，夜宿石家庄。

注释：

注1、蔡树梅（女），原是天津色织四厂工人。1969年至1971年6月任厂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1971年6月至1977年5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妇联主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副组长，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注2、张福恒原是天津第一机床厂工人，后任副厂长、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6月任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任，后任市环卫局副局长，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注3、赵成章时任解学恭的秘书、市革委办事组政研组副组长。

注4、坨子地天津市南郊区小站镇坨子地村，陈伯达在“小站四清”中将该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市政协委员姜德玉打成假劳模、富农分子。

注5、刘政原66军副军长，1969年任军长。

注6、李雪峰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1966年6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至4月，到天津工作。1968年2月至1970年1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

注7、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注8、西右营天津市南郊区北闸口公社西右营村，陈伯达在“小站四清”中树立的一个典型。

注9、政法公社天津市公安局文革中的群众组织。1967年2月24日，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后，宣布该组织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

注10、黄道霞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秘书，时任李雪峰的秘书。

注11、王良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注12、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毛主席语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第一版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共摘编语录366条。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做了修订。林彪于1966年12月16日为再版《毛主席语录》写前言，称毛泽东为“天才”。

注13、郑三生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注14、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注15、帅孟奇1926年6月加入中共。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56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是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68年4月，被康生点名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内奸”，被关押7年。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组织部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作者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天津市革委会主任，王辉为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

## 【荒唐岁月】

### 我的“文革”岁月之红歌与忠字舞

• 黎劲风 •

经历“文革”的人对红歌与忠字舞都记忆犹新。唱红歌、跳忠字舞，是文革时代的特殊符号。

百度一下，“忠字舞”是中国文革时期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群众舞蹈。它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的1966—1968年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渐趋衰微。

“忠字舞”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领袖；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忠字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专业人士多批评说没有美感，但有人说舞蹈姿势优美者可与后来的劲舞媲美。“忠字舞”给革命时代的娱乐匮乏提供了某种补偿，倒是不争的事实。

在唱红歌、跳忠字舞之前，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我居住的吴川县也不例外。《吴川县志》记载：1964年，全县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吴川县志》对1966年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也有记载。

文化大革命开展前，吴川县团委“从娃娃抓起”，组织了百多名干部子女，步行到离县城十几公里的覃巴公社（今吴川市覃巴镇）学习毛著。当年，我父亲是吴川县委农村部干部，我有机会参加这次活动，在覃巴公社一个村庄住了两三天，期间还安排了吃“忆苦餐”、晚会等活动内容。在吃“忆苦餐”时，我去了一趟厕所，避开了这次吃苦教育。这次学毛著活动，当地树起一个5岁小孩作典型，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晚会有一个快板节目介绍这小孩学毛著的事迹，我只记得快板的开头两句：覃巴大队覃文村，5岁小孩叶亚林……

有了“学毛著”的铺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民众很自然地接受了“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文革鼎盛时期，处处立忠字牌坊。我的左右邻舍都在门扇上大贴特贴各种“忠”字画。父亲也买回一尊毛的石膏像，打算立一个“忠字牌坊”。摆弄时，父亲一不小心把毛的一条腿摔断了。在我注视下，父亲干脆把毛的石膏像拦腰锯断，把全身像变为半身像，供作“忠字牌坊”。当年摔断毛石膏像的一条腿，是很大的事件，好在没被外人发现，没造成悲剧。

文革初期，全民狂热大搞“红海洋”，吴川县城的民众到处用红油在墙壁、柱子上绘上毛画像、毛语录，书写“三忠于”、“四无限”，连厕所也无一幸免。据吴川网友回忆：当年县城大塘边街有个年长者饮了些米酒，去公厕大便时别有意味地说：哪个孝狗（小人）亩识卓（不懂事），够胆让毛主席在这守厕所，够打靶（枪毙）！

1968年秋天，“忠字舞”席卷全国，吴川的忠字舞也开始大流行。不分男女老少，都面向毛的画像，挥舞着红宝书，口中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以表达对毛的无限忠诚。

那时我失学在家，没机会跳一次“忠字舞”，好像也没亲眼见过人们跳“忠字舞”。但1969年1月间，吴川有一位姓李的中年干部猝死于跳“忠字舞”，由此可见当年跳“忠字舞”的狂热。

文革期间，到处有高音喇叭，除了播放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两报一刊”社论等外，更多的是播放革命歌曲。当年歌颂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都是革命歌曲，即所谓“红歌”。红歌包含毛语录歌、毛诗词歌，连毛的《老三篇》也被谱曲，当红歌来唱。甚至林彪1966年12月16日为《毛主席语录》写的800多字的《再版前言》也被谱曲，成了空前绝后的红歌。中国著名歌曲作曲家李劫夫文革时风头出尽，成为毛语录歌的开山祖。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十首，其中八首由李劫夫谱曲。

这些耳熟能详的“红歌”深深植根于我大脑深处。尽管当年没多唱，但几十年过去，我依然会唱。就连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第一段“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如今我也能很靠谱地唱出来。

几乎与红歌、跳忠字舞同步，早请示、晚汇报也成了对毛泽东“表忠心”的祝颂礼仪和例行程序。也许是当时人们认为，要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

表达，因此发明了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泽东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早请示，晚汇报”很快成为整个社会风俗化、习惯化的软制度，成为每天都要实行的一项政治仪式。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都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每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都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据说，“晚汇报”最开始时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头”说“晚请罪”一词不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当年，我没机会参加“早请示，晚汇报”。据网友回忆：“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政治可靠”者“领读”。“领读者”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领读者”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读毛主席语录，通常根据当天工作选读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就读“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的则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网友蔡勇在《早请示，晚汇报》一文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文革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造神运动。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摔死之前，人们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和崇拜达到了无比疯狂的程度。在那狂热岁月里，无论大会还是小会，每个人发言前都要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而且要连喊三遍。发言结束时一定要带领与会者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写文章必须引用许多毛主席的语录，而且要用黑体字或粗体字排印。学校教室、办公室、会议室、食堂、宿舍都要张贴毛主席的画像。

《湛江市志》记载：1968年各地“三忠于”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形成高潮，广泛开展唱“样板戏”，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许多工厂大量生产形形色色的像章。

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也是文革时代的特殊符号。文革时期，几乎没人胸前不佩戴毛的像章的。吴川一家工厂也大量生产毛“戴军帽”的像章，还成了抢手货。我父亲也买回几十个毛主席像章别在一块红布上，形成一个心的图案，挂在房间的墙上，以表示对毛的忠心。我除了佩戴外，还多方收集了十几个毛像章，用一个原来装针水的小盒子装着，放在床头草席底下。有一天，这些宝物突然不翼而飞，令我伤心至极，也成了一宗“悬案”。

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1969年4月间的一天上午，吴川在运动场（今大富广场）集会欢庆中共“九大”。那时已失学3年的我也到喜庆的会场凑热闹，捡鞭炮是我童年一乐。在会场捡鞭炮时，遇见县委书记符在泽的儿子符小明，小明是我童年时较好的玩伴。文革前，我一家还在县委大院居住。我和小明，还有县委副书记张洪斌的两个儿子等八九个年纪相近的男孩时常在一起玩。我们玩得最多的是一种叫“打游击”的游戏。游戏时，我们几人分成两方，通常我和张洪斌的大儿子及小明是一方，张洪

斌的小儿子等人为另一方，先把对方全部“俘虏”的一方为获胜方。两年多不见，小明已长高了许多。但没想到，这次相见，竟成永别！

当天下午，传来小明遇难的消息。原来，上午集会结束后，继续开着用红旗、鲜花装点的“花车”沿着县城的主要街道游行，在梅岭小学读小学的小明长得眉清目秀、人见人爱，被女班主任选中当“花车”上的“花童”。“花车”游行结束回到县委大院门前时，又燃放起鞭炮，小明为捡鞭炮从“花车”上跳下，不幸摔倒伤及头部，不治身亡，给县委书记一家留下了无尽的痛苦。

害人不浅的唱红歌、跳忠字舞在中共“九大”前达到高潮。红歌《满怀豪情迎九大》在中共“九大”前半年已唱红神州，“九大”后改为《满怀豪情庆九大》，继续大唱特唱。直到九大后的1969年6月，毛觉得这种庸俗化反而会败坏他的形象，批示由中央印发《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中指出：“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此后，红歌与忠字舞、早请示与晚汇报等才逐步收敛。

如今，荒唐岁月已过去了几十年，但红歌红舞在国内外尚有市场。2011年，重庆还要求组织民众集中传唱36首红歌，并组织14支红歌队一路红歌进北京，登上首都舞台，以嘹亮的红歌祝福党的90华诞。而今日朝鲜，俨然是当年中国的翻版，当今朝鲜的红歌红舞，比当年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 原载《共识网》2015.6.25

~~~~~

## 【亡灵祭坛】

“迷糊”之貌 清澈之心——怀念谢晋澄同学

• 但 燊 • 樊 程 • 陈化新 • 郑玉歆 •

40多年来我们一直不能忘怀谢晋澄同学。

在1968年文革时期清华两派武斗中，谢晋澄被团派司机李正明开卡车撞倒后碾压致死，他是清华两派武斗中遇难的第一个人。40多年来每当我们同学聚会，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怀念他。我们中有的人和他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亲如兄弟；有的人和他上大学同班同宿舍，朝夕相处；有的人和他文革期间并肩战斗，相互支持；有的人在他遇难时就在他的身旁，撕心裂肺；有的人在自己家中保存他的骨灰十年之久，尽心守护；有的人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临近他学习生活过的清华旁，让他安息。他是我们的同学和兄弟啊，我们忘不了他！他的音容笑貌总是那样清晰地浮现在我们面前，他那貌似迷糊实则专注，有着清澈心灵的形象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如今我们都已年近七旬，我们走过了共和国成立后的全部历程，经历过许多人生的艰难曲折，算不上什么艰险，但也不容易。我们走过来了，可是怎能忘记和我们一起在风雨中同行，不幸倒下的同伴呢？谢晋澄遇难于文革两派武斗中，他不是英雄，但也绝不是没有理性的狂热之徒。他聪明好学，兴趣广泛，为人随和，待人真诚，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是一个有思想的，正直的，富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

.....

#### ◇ 文革中的“单干户”

1966年的6月1日同学们都沉浸在期末考试的紧张复习准备之中，浑然不知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正在来临。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校长陆平和校党委，这是非常不寻常的。那时哪有基层干部敢公开把矛头对准上级党委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吗？可是同时播出的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却支持这张大字报，岂不咄咄怪事。

谢晋澄这个政治上的“小迷糊”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还在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可是接着发生的事重大而又突然：第二天同学们纷纷跑到北大去看大字报，紧接着在清华有人贴出了大字报，揭露蒋南翔校长和清华党委的修正主义错误，立即就有人站出来坚决捍卫蒋南翔校长和校党委，“反蒋”“保蒋”战斗打开了，小道消息满天飞，课上不成了，整个学校炸了锅。

谢晋澄被惊“醒”了，可是也完全懵了。接着蒋南翔被“罢官”，工作组进校，一切都变化得那么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谢晋澄开始在清华校园里看大字报，有时也去北大看大字报。

谢晋澄喜欢看大字报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清华武斗爆发之前。他不但喜欢看，还喜欢在别人的大字报上写批语，只要是他认为重要的大字报，他都会批上几句，落款总是“自九四班谢晋澄”。蒯大富和谢晋澄并不认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蒯大富还清楚地记得谢晋澄在他最艰难的时刻，在他的大字报上的支持留言。蒯大富回忆：“1966年7月我贴出了《站住，叶林，把账算清了再走！》的大字报，那时虽然已解除了对我的软禁，不用写检查了，但我们还是很孤立，谢晋澄在大字报上签名‘坚决支持 自九四班谢晋澄’，令我十分感动。在其后一段时间我写的大字报上，几乎都有谢晋澄表示支持的签名，在那个时候是特别难得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一直想去拜访谢晋澄，和他好好聊聊，但是始终没有聊成。以后倒是和他有过照面，但是没有详谈过。听说4.29武斗中他被汽车压死了，我特别特别难过。”

清华文革初期，工作组把一部分人打成“蒯派”，“蒯派”在政治意义上有点像当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一进大学就接受“反右斗争教育”的清华学生都深知千万不能和“右派”沾边，只要立场稍不坚定就会滑向“右派”的泥坑。因此即使当时已宣布撤消工作组，解除对“蒯派”的政治压迫，但是人们仍记住“反右斗争”的教训，心有余悸，不敢和“蒯派”沾边，更别说支持“蒯派”了。

谢晋澄不是“蒯派”，他本来是站在这个“蒯派泥坑”之外的，但是当他看到工作组对待“蒯派”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扣帽子，打棍子，以势压人时，他很反感强权压制造成的不公，他内心的正义感驱使他毅然站出来，表明身份支持蒯大富。谢晋澄也真是个不懂政治的“小迷糊”，还真有热血。

自九年級的周洪源清楚記得，有一次他和謝晉澄一起去看大字報的情景。在“清華學堂”附近有一張動農系研究生寫的大字報，大概是“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類的，是老四觀點，反對有人在打倒走資派、壞人時，將一般幹部、好人也一起打倒，大字報後並配有

一张漫画，一只大拳猛击下来，拳下有走资派、坏人，也有许多一般干部、好人。谢晋澄看得十分认真，看后非常激动，大赞文章写得好，漫画也画得好，立刻在大字报后留言支持叫好，并签名：“自九四班谢晋澄”，还表示要去拜访作者。给周洪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平时的小迷糊，大事不迷糊，肯动脑筋，头脑很清楚。

在清华文革期间，同学们纷纷组织各种战斗组，这是清华文革中的主要运动形式。战斗组是一些观点相近的同学老师，跨系跨班自由组合的，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精神，一起讨论互相启发，将观点写成大字报，以战斗组的名义贴出去。谢晋澄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组，他总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也偶尔会到当时自九的“红炮”战斗组去发发议论，但是从来也没有参加过“红炮”，没有和“红炮”的人一起写过大字报。

他不参加任何战斗组，他的观点在看大字报中形成，在大字报批语中表明，这是一种独特的参与文革的方式，他基本上是文革中的“单干户”。

谢晋澄自己也写大字报，他自己写，自己贴，从不事先和人探讨大字报的内容。张炜同学就曾看见谢晋澄在批判工作组期间，手拿一摞大字报，从宿舍12号楼西门出来，一脸严肃地自个儿去张贴，和往日两眼眯缝的“小迷糊”形象大相庭径，至今留有深刻印象。

有一段时间谢晋澄一个人办起了《动态报》。文化大革命时，所有学校都停了课，精力旺盛的青年学生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到处去闹革命，大字报满天飞，到处在发生着革命行动，天天有人熟悉的领导人物被打倒，各种小道消息铺天盖地。不了解局势就难以判断方向，除了写大字报外，一些战斗组派人到各个学校、各个部委、各个热点地方去了解情况，收集资料，然后汇编成“动态”，散发到学校或社会上去。因为消息太多，形势又是瞬息万变，要及时扑捉到这些信息，并及时汇编，刻印，散发，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往往是一个战斗组里一大批人分工合作才能完成。

可是谢晋澄却一个人办起了“动态”，他到处去了解情况，抄录有代表性的大字报观点，自己整理编辑信息，自己刻写蜡版，自己印刷，自己散发，“一条龙”作业，十足文革“单干户”。他认准的事，就会十分专注投入，他很少会考虑自己干不干得了，结果又会如何。此时他又十分“专注”，完全沉浸在编“动态”中，一个人昏天黑地忙忙碌碌。

谢晋澄还有一段文革中不为同学了解的经历。大概在1966年底，谢晋澄在了解动态的过程中接触到“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当时在全国赫赫有名的首都红卫兵司令部，在全国造反派中享有至高的威望。谢晋澄成了“首都三司驻昆明联络站”的负责人之一。他究竟在联络站担任什么职务，干过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谢晋澄本人也从来没有对年级的同学说起过。我们曾问过蒯大富，“三司”任命过谢晋澄为三司驻昆明联络站的负责人吗？蒯大富是当时的“三司”负责人之一，外称“蒯司令”，他又对谢晋澄有深刻印象，他应该知道。蒯大富回答：毫无印象。并说，那个时候北京的红卫兵去到外地自己打个“三司”的旗号就可以发号施令了。谢晋澄到昆明成为“三司”驻昆明联络站的负责人之一，大概就是当时“三司”的某个人邀他同去昆明，也没有什么任命，他就立刻当上“负责人”这个“官”了。在云南省委书记闫红彦被迫害自杀后，周总理派专机接包括谢晋澄在内的几个人到京，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一国总理派专机把几个普通人接到北京了解情况，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文革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可见文革时地方的党政系统已瘫痪不灵到怎样的程度了，周总理是在运用他个人的权威掌控全国的局面。

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闫红彦是开国陆军上将，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一位重要的封疆大吏。1967年1月8日，闫红彦在“四人帮”的威逼迫害下含冤自尽。

1月8日凌晨1点，陈伯达打电话给闫红彦，非常刻薄的指责“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了命我负责陪你一条命！……这就是中央的意见！”，在闫红彦解释边疆的稳定的重要性时，陈伯达不听并大骂他“顽固”。身为陆军上将、封疆大吏的闫红彦哪里受得了文人书生陈伯达的恶语咒骂。清晨4点，造反派闯到闫红彦的住处，秘书急忙去通知闫红彦，发现闫红彦已自杀身亡，临死前写下一张纸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当时的“动态”报道了谢晋澄等人向周总理汇报闫红彦之死的事。坐周总理派去的专机回北京，当面向周总理汇报，这在一般人看来是一份难得的荣耀，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幸运”之事，可是谢晋澄在回到学校后，从来没有主动向人提起此事。当好友陈化新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你们乘周总理派去的专机回来，当面向周总理汇报是怎么回事？”，他告知这位知己老同学：“我当时是最早到达闫红彦的住所的人之一，周总理想了解闫红彦死时的真实情形。”淡淡的几句话，没有任何的炫耀，吹嘘，甚至连“绘声绘色”都没有。谢晋澄就是这样一个“实在人”！

在谢晋澄遇难后，很多人不理解瘦弱矮小的“小迷糊”怎么会拿起长矛参加武斗呢？

谢晋澄对文革的投入使他常常有“超乎人们想象”的举动。在蒯大富刚刚被解除“软禁、写检查”的时期，蒯大富那时还比较臭，蒯大富张扬的个性和他向工作组“夺权”的言论，使当时清华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人，“蒯派泥坑”是沾不得的。这时谢晋澄却鲜明地站出来支持蒯大富，“小迷糊”做出了“超出人们想象”的举动；就在同时期，在清华大礼堂一次关于蒯大富的辩论中，从来不善言辞的谢晋澄竟然跳上讲台，抢过麦克风，自报家门“自九四班谢晋澄”，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支持蒯大富，这真是“超乎人们想象”；一个人办“动态”，不也是“超出人们想象”吗；在学校里从来没有表现出有任何组织、领导才能的“小迷糊”，竟然能在昆明当起了“首都三司驻昆明联络站”的负责人，还乘周总理派出的专机回北京向周总理当面汇报闫红彦自杀事件，这也太“超出人们想象”了。

当我们把谢晋澄的这些“超出人们想象”的行为串联起来，看到的是“小迷糊”谢晋澄的另一面，他原来是个有理性，有思想，有激情，敢担当，富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

“有思想，追求真理，有热血，敢于担当。”，这是任何时代的青年都应该崇尚的品德，永远不会过时。

人们奇怪，一个从前政治上的“小迷糊”，为何在文革中“突然”变得积极了呢？郑玉歆、张鸿宾等同学至今保留着谢晋澄文革中在天安门广场和串联时的照片。照片中的谢晋澄一副振奋和意气风发的样子，和文革前相比就像换了一个人。同学们感慨道：“毛主席在文革中把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这里面有普遍的原因，也有具体的原因。

今天分析起来，是多方面的因素在改变着谢晋澄。



首先是大的形势。狂热的文化大革命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谢晋澄尽管政治上“小迷糊”，但他内心里也像所有同学一样衷心热爱毛主席，毛主席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革命时期谢晋澄在天安门广场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也同样激荡着谢晋澄的心。文革前政治是追求进步的人的“专属领域”，不善言辞的谢晋澄似乎不得入门。文革前年级的政治活动都是在政治辅导员、团支部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他用不着思考，只要随大流就行了。如今党团组织都瘫痪了，他自由自在地徜徉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海洋中，没有具体的方向，一切要靠自己的判断。当然总的方向是有的，通过两报一刊传达的毛主席的各项指示就是斗争的大方向，不过指示太原则，前后的指示有的还是有点儿互相矛盾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就要看自己如何来分析判断了。这有点儿像到颐和园游玩，自由自在，更有点儿像下围棋，目标是赢，但怎么个下法才能赢，全凭自己对棋局的判断。这些谢晋澄熟悉并且爱好，原来政治还有这么个玩法。

谢晋澄没有家庭的“包袱”，也没有个人的教训。父亲在江阴农村中学那个小单位，周围的同事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父亲历来言语不多，历次运动都是随大流，未受过冲击。谢晋澄自己文革前，政治上没有上进的欲望，从中学到大学，一直随大流走过来，没有什么辫子被上级组织或是别人抓过。自己从来没有吃过政治的“苦头”。虽然入大学时接受过反右斗争的教育，但那些事都与自己无关，自己无切身体会。右派是“反党”，现在在文革中干的一切自己可都是为了拥护共产党，捍卫毛主席的啊。谢晋澄无所顾虑地投身到文革中去。

谢晋澄在文革中的积极表现也与他“专注”性格有关。以前他不修边幅、“迷迷糊糊”，主要是在“专注”学习，也“专注”下围棋，“专注”焊收音机，这些就够他“专注”的了，他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关心政治，政治之门也不得而入，和生活小节一样“迷迷糊糊”就行了。现在停课闹革命，大字报的丰富内容和文革形势的瞬息变化时刻在刺激着他，政治的大门敞开在面前，自从他开始看大字报，开始思考，他就进了这扇大门，一旦进去，他便“专注”，一旦“专注”，他便全情投入，他就是这种性格。

谢晋澄在文革中的积极表现更是他心灵纯洁，富有正义感，善于思考，敢于担当的品质的反映。文革前谢晋澄政治之门不得而入，在他的心灵深处没有太多的政治污染，保留着朴素的良知、纯洁和正义感。他不太懂得察言观色，揣摩上级的意思，为追求进步说一点违心的话那一套东西。他以自己这份朴素良知、纯洁和正义感来观察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判断是非。当他认为什么是自己应该干的事时，他就会全情投入；当他感到强权压迫的不公时，他就要去抗争，而根本不顾及后果。

◇ “他就倒在我的身边，再也没有起来”

谢晋澄很早就站出来支持蒯大富，他也自然很早就参加了蒯大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1967年初，他从昆明返回了学校，发现清华造反派内部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很大分歧。以“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等战斗组为代表的一批人，坚持“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认为“解放后的十七年是黑线主导的”，“清华的干部队伍基本上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执行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路线”。而以“东方红纵队”，“天安门纵队”等战斗组为代表的一批人则认为“解放后十七年是红线为主导”，“清华的干部队伍基本上好的和比较好的，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极少数”。两种观点完全相反，针锋相对。在看了大量的大字报后，经过认真思考，谢晋澄比较认同后一种观点。谢晋澄认同后一种观点也是由于他看不惯蒯大富咄咄逼人，以势压人的那一套作法。1967年4月，“414”从“清华井冈山”分裂出来，谢晋澄参加了“414”，他由支持蒯大富变成了蒯大富的对立面。

谢晋澄在文革中喜欢思考，善于思考，也敢于“行动”，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过激的行动，他没有参加过给干部、老师戴高帽子游街之类的行动，也从来没有干过打人，侮辱人的事。在他的内心始终保留着理性和一份良知，没有因狂热而乱，没有为愤怒而失。

1968年4月23日早上，在蒯大富等人的策划指挥下，团派武斗队抢先占领了学校大礼堂、新水利馆、旧水利馆以及旧电机系馆，紧接着，上午9点30分团派电机系“捉鬼队”又强占了学生11号楼，挑起了预谋中的清华园内全面大规模武斗。中午11点多钟，414派占据了12号楼，后来又占据了5号楼。414派与团派在东区学生宿舍楼间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

谢晋澄对蒯大富等一些人挑起清华武斗十分愤慨，瘦小的他没有选择离开学校而参加了守卫12号楼的队伍——414自九战斗队。

即使在这时谢晋澄仍坚守不能打人的原则，史德明同学回忆：“在清华武斗发生后，记得有一天，我们在一起讨论起如果捉到团派的同学要不要打的时候，谢晋澄表示决不能打，都是同学怎能下得了手！多么善良的同学！”

那时414战斗队的装备非常原始。一段长约2米左右的暖气管，前端锯成斜角，再扎一根红布条就是长矛了。每个人腰间扎根皮带，上衣内左右胸前各放一本厚书，用来保护要害部位，这就是防身的“盔甲”。

武斗初期的交战也是“原始”的。往往是一方的人员冲过来，另一方的人员就后退，过一会儿，另一方的人员冲过来，这一方的人员就后退，基本上是比较哪一方更“人多势众”。武斗双方毕竟是同学，绝大多数人都下不了手，自己也是害怕的。蒯大富等人挑起了武斗，除了个别的极端分子之外，绝大多数团派同学都是不明真相参加武斗的。414派绝大多数同学出于义愤，仓促上阵。双方绝大多数同学其实都没有真正去“厮杀”的心理准备。

40多年后在自九同学怀念谢晋澄时，樊程同学悲愤地讲出了那令人不堪回首的一幕。

“4月29日下午，我带领414自九战斗队的三、四十人，由西区经13号楼前东、西区通道返回12号楼。途中，突然得到消息：团派派人在九饭厅抢粮。九饭厅位居5号楼和12号楼北面，是这两栋楼学生用餐的食堂，如被团派占据或抢劫，驻扎在该楼的414人员将无处吃饭，无法生存。为尽快阻止团派的行动，我们迅速跑步急进。”

“队伍接近九饭厅西面洼地时，看到有些团派人员在九饭厅西门忙碌地进出抢运粮食，大部分则手持长矛站在洼地上戒备。此时，团派也发现了我们的到来，人员快速向洼地中部集结。我们跑到5号楼西北角，跳下土路沿着斜坡，直向洼地中部的团派队伍冲去。队伍刚下到坡底，就遭到团派大弹弓车的攻击。我与谢晋澄、F××及Y××四人是一个战斗小组，迎面打来的一块砖头击中了Y××的面部，伤势很重，F××便搀扶着满脸是血的小Y往回撤离。冲击没有成功，414的队伍退回到12号楼前。”

“团派见我们撤回，便向12号楼方向发动进攻，他们沿着九饭厅西南角旁边的一条土路，进到九饭厅南侧正门前。为阻止团派抢粮，自九414的队伍迎上前去，双方在九饭厅正门偏西位置形成短暂对峙状态。由于路面狭窄，谢晋澄和我两人并排站在队伍最前列，他在我的左侧。”

“我们双手紧握长矛，两眼盯着面前同样手握长矛的团派武斗队员。此时，在我们左后方，一辆解放牌卡车正沿着5号楼北的土路，由西向东驶来。我瞟了一眼，没有多想，继续紧张地与对方对持。突然，对面团派人员慌乱后退，我也感到背后有些异样，下意识地扭头一看，只见那辆卡车已转变方向，开足马力，直接朝着我们身后疯狂地冲了过来，后面的队伍已被冲散，汽车前部马上就要撞到我和谢晋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本能地跳到右边一根电线杆旁，还没有来得及喊叫一声，卡车已从我身边急驶而过，撞向了谢晋澄。”

“接着发生的这一幕永远惨痛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了：就在汽车将要撞到谢晋澄的一刹那，只见他右手单握长矛，左手松开，上身向左转动，似乎已感觉到危险的到来，想转身看看后面的情况。就在这时，凶狠的杀手驾车直接向他撞去，卡车前部保险杠将他撞倒在地，左前轮从他身上压过，谢晋澄的身体在车底翻转了一下，紧接着右后轮又从他的胸部和头部碾过，随即经九饭厅西南角驶回团派控制的洼地。谢晋澄被撞倒碾压，他就倒在我的身边，再也没有起来。我顿感撕心裂肺，扑上去大喊：‘谢晋澄！谢晋澄！’，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凶残的司机竟然会这样毫无人性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汽车直接冲撞碾压同学！”

“这是清华第一例武斗受害事件，悲愤的同学强烈要求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领导出面，由市公安局派人验尸，严惩杀人凶手，立即派人处理并制止清华园内的武斗。4月30日414同学抬着谢晋澄的遗体在校内游行，5月1日上午又将遗体抬到北京卫戍区门前，要求司令员和政委出面解决问题。据说此事惊动了周总理，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处理。”

“5月1日晚上，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来做检验。几天后，市公安局给出了检验结果：‘重力挤压至死。’”

谢晋澄遇难后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的一本日记，在日记中他写道：“我宁愿牺牲在抗击帝国主义的越南战场上，绝不愿意在两派的武斗中作无谓的牺牲。”

多么善良的愿望，多么残酷的现实。让人扼腕，让人愤怒。

是丧尽天良的司机李正明杀害了谢晋澄。

是以蒯大富为首的极端分子挑起清华武斗，使包括谢晋澄在内的两派十几名学生老师遇难，使1968年7月27日到清华宣传制止武斗的首都工农宣传队的五位师傅惨遭屠杀，使清华大学的几百名师生，工宣队的700多名师傅受伤甚至致残。

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四人帮”的兴风作浪，使全国包括谢晋澄在内的百多万人惨遭杀戮，使几千万人的身心遭受巨大摧残，使中国的经济倒退到崩溃的边缘，使几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惨遭劫难，使中国6亿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

◇ 安息吧，谢晋澄！

谢晋澄遇难后，同学们不知怎样告知一生饱受打击的谢晋澄的父亲，我们如何启齿呢？

这副重担还是落在了陈化新同学身上。5年前当谢晋澄荣登江阴“状元”榜时，老父亲是觉得何等荣光，自打谢晋澄的母亲去世，十几年来的苦难、操心、付出都是值得的。那时陈化新看到的是老人的欣慰、希望和对儿子前程的憧憬。今天却要把噩耗告诉老人，将老人二十多年来的寄托，后半生的希望打得粉碎，这太残酷了！

陈化新把老人从江阴领到了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守候在那里的罗民、李明文同学试图劝阻老人去看谢晋澄的遗体，怕老人经受不起打击。但是老人怎么也要见儿子最后一面，当他看到面目全非的儿子时，他一下子扑在儿子的身上嚎啕大哭。站在一旁的同学也非常悲伤，他们不断地劝老人“节哀”，“保重”。此时的老人哪里能控制得住自己的悲痛呢？几十年来的苦难一下子涌到眼前，当自己刚刚进入中年就失去了心爱的妻子，又不得已把襁褓中的女儿送人，从此没有了欢乐，苦难的眼泪只能咽进自己的肚里，自己又当爹又当娘，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在自己已近黄昏之年，却失去了儿子这唯一的亲人，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希望，失去了自己活在世上的唯一动力，苍天啊！你为甚么这样不公地对待我，让我遭受人生最为悲痛的“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的苦难！

谢晋澄的遗体火化后，同学们尽其所能挑选了一个好的骨灰盒。可是遭受了沉重打击的虚弱老人再也抱不起儿子的骨灰盒了。难道要在妻子的坟旁再添一座新坟？难道还要给在天国的妻子带去这个噩耗吗？他的天已经塌下来了，难道还要让他面对一老一小的坟头，天天来折磨自己几近流干了血的心吗？

老人没有带走儿子的骨灰盒。同学们不想把骨灰盒放到公墓里去，希望等过一段时间，老人平静之后再把骨灰盒交给老人。可是不放进公墓眼下放到哪里去呢？学校是不能存放骨灰盒的，再说学校两派正在武斗，没有一处安静的地方。郑玉歆同学没有多说，他把谢晋澄的骨灰盒捧进了在北京的自己家，放在了自己的房间。他知道父母是极有善心，通情达理的人，他们会理解自己的行动的。

1968年底九字班的同学毕业分配了，谢晋澄的骨灰盒怎么办呢？面对不了解的接收单位，未知的前程，就要各奔东西的同学们对于怎样处理谢晋澄的骨灰盒一筹莫展。郑玉歆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谢晋澄的骨灰盒还是放在我家吧。”这对于郑玉歆有多难啊，他当时已被分配到黑龙江，就要离开北京。

没想到郑玉歆的这句话，谢晋澄的骨灰盒竟在他的北京家中存放了十年。郑玉歆本人多年后费尽周折从黑龙江调到北京远郊的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向阳化工厂（现在的燕山石化总公司二厂），谢晋澄的骨灰盒安静地放置在他的房间十年，一点也没有挪动。

1970年的春天，陈化新和但桑专程到谢晋澄的家乡，看望谢晋澄的父亲，希望老人家把儿子的骨灰盒接回家。那时的谢父身体更加消瘦，头发几乎全白，神情木然，看上去比两年前衰老不少。两人的问候没有唤起老人的一丝笑容。谢晋澄要活着，不也是和他们两人一样参加工作了吗？谢父只有酸楚哪里笑得起来。当陈化新用家乡话悄悄问起他，是否把“谢晋澄”接回家，老人木讷地摇了摇头，他已经无法从沉重的打击下再站起来了。

1978年10月，几个同学有机会在北京相聚，再次谈起谢晋澄的骨灰盒，认为还是“入土为安”的好，最好就在这次众人相聚时将谢晋澄的骨灰下葬。选择下葬的地方颇费心思，谢晋澄下葬的地方是他的永远安息之地，不应受到任何打扰，最好还能靠近他生前生活学习过的地方。众人实地勘察了多处地点，选中了一处幽静而又靠近清华大学的地方。当晚众人找来了洋镐、铁锹，弄来了水泥、砂子，挖下一个深深的坑，在坑底垫上厚厚的水泥砂浆，小心翼翼的放入了谢晋澄的骨灰盒，再在骨灰盒的四周和上面用厚厚的水泥砂浆包起来，平整好土地。众人站在谢晋澄的长眠之地前，深深地鞠躬，默默地致哀。他们在墓地没有树立任何碑记，他们在心中牢牢记住了这个地方，他们更在自己的心中为谢晋澄树立了“墓碑”：安息吧，谢晋澄，我们永远怀念你！

4 0 多年来我们一直不能忘怀谢晋澄同学。

我们怀念谢晋澄因为他是我们大学的同窗，我们和他之间有着浓浓的同学情谊。大学时代是值得怀念的，那是我们像孩子吮吸乳汁一样自觉地汲取知识的年代，是锻炼我们才华的年代，这之后不久我们便踏上社会，用知识和才能服务社会；那是我们最单纯的年代，同学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同学友谊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在我们年近古稀之时，对这种纯真的友谊尤其怀念。

我们怀念谢晋澄因为在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给了我们积极的影响。他真诚，平和，专注，认真，富有正义感，我们透过他的“小迷糊”表象看到了他清澈的心灵，看到了他善于独立思考，追求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今天看来，在一定程度上他不也是在践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吗？

我们怀念谢晋澄也是在怀念我们和他在那个年代的种种经历。在文革前，我们的思想被禁锢在党指定的框框中，不得越雷池半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参加了军训，和其它社会活动，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增加了对社会的了解。文革是一场浩劫，但是出乎毛泽东本意的是，我们也得以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思想禁锢，解放思想，对文革中发生的事情进行思考判断，来决定自己拥护还是反对的态度。我们有过激情，受过历练，其中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只要我们正视这些错误，检讨其中的教训，就成了日后我们踏上社会的一笔财富。

我们怀念谢晋澄也是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毛泽东在文革中把他的阶级斗争的学说推向了极致，多少人被批斗，多少家庭破碎，多少人惨遭杀害，全国学校停课，亿万学生中断了学业，知识越多越反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被颠覆，人性、良知被抛弃，国民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使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劫难。我们的这篇怀念谢晋澄的文章就是要告戒我们自己及后人，绝不能让文革在中国再现。

我们怀念谢晋澄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人性和良知的重要。如果说在文革中谢晋澄和我们对于文革中那些丧失良知、没有底线的“革命行动”曾经反感，并与之有过抗争，今天我们就要更自觉地弘扬人性、良知等普世价值，认识到只有国家走上了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才能使人性的光辉普照中国大地，从根本上防止文革在中国的重现，使谢晋澄的悲剧今后不会再重演。让我们在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中做一个拥护者，支持者。

感谢：在写本文的过程中，清华大学自九年级的李明文，刘寿和，罗民，史德明，王疾舟，夏雨人，夏宇闻，张鸿宾，张炜，郑易生，周洪源等同学以及自0年级的刘守岳同学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很多关于谢晋澄的资料，还有许多同学表达了对谢晋澄同学的深深怀念。作者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

2 0 1 3 年 1 2 月 1 5 日初稿

2 0 1 4 年元旦修改

作者简介

但燊，1 9 4 6 年生，1 9 6 3 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 9 6 8 年毕业。

樊程，1 9 4 6 年生，1 9 6 3 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 9 6 8 年 1 2 月毕业。

陈化新，1 9 4 6 年生，1 9 6 3 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 9 6 8 年毕业。和谢晋澄是同乡，是他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

郑玉歆，1 9 4 5 年生，1 9 6 3 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 9 6 8 年毕业。

□ 摘自《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往事非烟】

“小三家村”事件——清华园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冤案

• 刘守昭 •

一、前言

“小三家村”是文革初期清华工作组泡制的一场文字狱的代称。

李文藏、甘小杰、吴文忠三人因署名“李小忠”，在1966年6月20日贴出大字报而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小三家村”，捏造出一起震惊清华园，乃至影响到全国的特大冤案。史明远老师还因被此案波及而成为清华文革第一个非正常死亡的受难者。

1966年5月，江青一伙发动了一场对所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批判，致使邓拓、吴晗、廖沫沙惨遭迫害。文革的腥风血雨也由此迅速地传遍清华园。此后于1966年6月20日，李文藏把从北京林学院抄回来的题为《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即“二十二个问题”）的大字报，转抄为《访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在新水利馆南墙上贴出，署名“李小忠”。这张大字报是经工作组同志看过认为很好的情况下，才贴出去的。“李小忠”只对大字报“二十二个问题”中重复的内容作了删减和归纳，未作其它改动。

许克敏谈话纪要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谈了学校里的运动怎么搞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有学生问：派来的工作组成员都是原单位的干部，不参加工作组的话，说不定在原单位有可能就是走资派，现在却当了工作组成员；又问：对他们讲的话能不能提意见、批评，能不能怀疑？许回答说：可以提意见、批评，个别成员如有问题可以怀疑、可以调查。许克敏的谈话全篇都按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并引用了很多毛主席语录。

大字报被广泛传抄，不胫而走，大家看了都非常兴奋。到6月底已迅速贴遍全国34个大中城市。

但是几天之后，“二十二个问题”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写大字报的北京林学院曾宪均等5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与此同时，“李小忠”也被清华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小三家村”。

大批赞同、传抄、翻印大字报的师生被整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四千余人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亡”。〔1〕

二、工作组对“小三家村”的批判和迫害

李文藏：1960级汽65班学生，他父亲在1955年我国第一次授军衔时是大校。

甘小杰：电机系电器教研组的青年教师。

吴文忠：1960级汽61班调干生，党员。

当批判“小三家村”开始时，所有的工作组成员都矢口否认知道和赞同过“二十二个问题”的大字报了。工作组不断引导班里同学说，“小三家村”的要害是煽动怀疑工作组，这就是怀疑党。但是工作组又从来没有说过许克敏是黑帮。工作组对大字报内容无法指责，就采取查抄“李小忠”日记的卑劣手段。当李文藏要收条时，得到的是斥骂：“你太嚣张了！别以为你老子是高干，说不定现在已经打倒了。你必须老老实实交待认罪材料。”

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张维引回忆说，当时吓得她把从中学开始未曾中断过的日记全都销毁了。

同学们从“李小忠”的日记里，得到的是让工作组大失所望的结果。同学回忆说，李文藏的日记堪比雷锋日记。后来只查出一首小诗，有同学至今记得：“我生命的日子，就像这一串葡萄，那大个儿的，红彤彤的，酸溜溜的甜哟。那小个儿的，青青的涩得腮帮子疼哟。剩下的那几个，不知道是什么味儿的哟”。李文藏患有严重的肝炎，休学过一年，或者感伤过。工作组不但不同情和帮助安慰他，反而污陷李文藏是在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构筑了新一轮的文字狱。

工作组还把同学批判稿中说“小三家村”为蒯大富摇旗呐喊，上纲上线为是蒯大富的黑高参。对此，李文藏驳斥说：“我与蒯大富素不相识，我怎么成了黑高参？‘小三家村’有何根据？”。工作组理屈词穷，就喊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对“小三家村”大约批斗了十几次，最后一次批判会是在大礼堂，同时向全校广播。吴文忠回忆：我们站在台下边。群众在底下呼口号，还高喊吴文忠不老实。我没挨过这种整，觉得头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左看看，右看看，他们俩笑了，原来他们都把腰弯下去了，我没弯腰，这才明白我不是不低头是不弯腰。当时我们很不服气。批判会由工作组一手策划，王光美亲自指挥排练了一个星期，到什么地方拍桌子，到什么地方呼口号，都反复演习过。但批判会上王光美始终没有露面。

### 三、史明远之死及他身后悲凄哀婉的故事

据“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2〕记载，其中：“序号1.史明远，男，清华大学自控系助教，共青团员，1966.7。5.在京郊十三陵服毒药身亡”。

与史明远同系的孙怒涛对史明远之死有更多的了解。他说：自动控制系是机要系，师生需凭出入证方能进入西主楼四楼系馆。而史明远所属的510教研组的密级更高，其成员要持另一种特别出入证才能进入它所在的一区。工作组进校后不久，教研组的老师在校内看到一张转抄来的访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谈话纪要的大字报，就将大字报抄了回来，由史明远在学习会上念了这份对许的访谈。此后，他还与其他老师将其油印成少量传单，在教研组范围内各自取用，并抄写成大字报贴在西主楼墙上。工作组认为史明远等油印这张传单以及抄成大字报贴出是反对工作组的行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此外，史明远还提出，进入510教研组的工作组人员必须通过相应的密级审查，并向上级工作组领导提出了要求。此举反被工作组认为是对工作组明目张胆的挑衅和抵制。这些便成为史明远反工作组的“主要罪状”。于是，工作组将史等多人打成反工作组的反党小集团，将史定为小集团头目，在上班时将他们几个人分屋隔离，责令他们交代问题并相互揭发，同时在教研组范围内开展批判。一区走廊内贴满大字报，声势甚为凶猛，给史等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史明远不堪忍受工作组巨大的威逼与压力，终于出走到明十三陵服敌敌畏自尽。

16天后才在深山里找到他的遗体。时年，仅30岁。

史明远是清华文革的第一个罹难者，也可能是受许克敏访谈纪要和“小三家村”冤案波及的第一个受难者。

就在整理本文的前些天，郑捷校友在校友网的帖子中述说了史明远生前相恋多年的恋人，1962 年自8 班的丁桂林的近况。她后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至今空巢独居在江西九江，已离不开轮椅。她一生最爱史明远，常常深情回忆。史明远是她心中唯一永远的爱和痛。她是云南军区一位司令员的女儿，如果不是史明远在文革中含冤自杀，她是不会落到这种地步的。

已逝的固然有着悲凄的故事，而活着的又有多么让人动容的哀婉故事啊！

#### 四、“小三家村”平反

吴文忠回忆，他和李文藏各住一间宿舍，被“管制”起来，吃饭、上厕所都有人跟着。直到有一天下午（7月29日），他在睡梦中被两位军人唤起，用小汽车直接拉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个会上他听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检讨，承认了派工作组的错误，最后毛主席还出场接见。事后得知，“李小忠”三人中仅他一人参加了大会，但足以确证小三家村不是反革命，而是文化革命积极分子。

其后，8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全校大会上宣布给“蒯派”平反，小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帽子不复存在。然而在一段时间内，“蒯派”依然臭烘烘的，“虽然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好东西”。他们只能联合各校的受迫害同学继续争取全面彻底的平反，直到10月底北京（新）市委做出“关于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大字报的检讨”。吴文忠李文藏他们遂以市委彭真办公室为基地，架起大喇叭，广为宣传。

在清华大抓“蒯派”，迫害“小三家村”的罪魁祸首是王光美。和许多清华同学一样，他们积极参加了1966年底炮打刘少奇的12.25大行动。

#### 五，揭开许克敏下落的谜团

在工作组批斗“小三家村”的全过程中，清华园师生没人知道引发事件的主角许克敏到哪儿去了，甚至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人。

“小三家村”平反后，“李小忠”等当面质问北京新市委大学部部长和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严令他们必须亲自找到许克敏，到清华一起当面对质，以彻底洗刷干净强加在“小三家村”身上的不白之冤，绝不能让许克敏活不见人，死不见鬼，不了了之。

找到许克敏时，他被藏在廊坊附近的一个农村里，已改名换姓。据记载，“许克敏，贫农出身，小时要过饭，本人成份工人，一直作党的组织工作”。

“李小忠”等把许克敏请到清华园，让他看了三天大字报，又对他做了工作。许克敏承认是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亲自交待他：“即使大字报里的话是你讲的，你也咬死不能承认”。



至此，“小三家村”冤案才真相大白，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再后来，清华没人再过问过许克敏。

## 六、平反后的“小三家村”

李文藏毕业分配到天津东方红拖拉机厂，后调至农机部主管农用车工作。1996年因病已不能参加汽65班毕业三十周年校庆聚会，大家去看望他。不久后病逝。

甘小杰继续在清华任教，高工，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直至退休。

吴文忠毕业后回到天津建筑机械厂，后支援三线，来到华山脚下的黄河工程机械厂，资深高工，直至退休。

## 七、后记

2014年8月2日，李文藏的同班同学王璋，出于积压在心头48年之久的内疚和对李文藏的深深歉意，在清华校友网1964年级论坛上登载了《同窗情未了——忆汽65已故同学》。文章回顾了他当年在工作组的欺骗和威逼下，被迫参加了对“小三家村”里李文藏同学的批斗会。文章引起广泛重视，至8月18日已有81个跟帖，浏览访问者已近900人次，使“小三家村”的始末来龙去脉更为清晰，并引出了史明远生前恋人丁桂林那催人泪下的哀婉故事。

跟帖的都是1966年文革期间在校的校友：汽65班王璋、刘守昭，自804班郑捷，无803班孙耘，力9班叶志江，自9班周济生，电0班王文中和钱久业等。

本文是根据以上文章和跟帖整理而成。整理过程中得到年近八十的吴文忠、甘小杰和众多校友的帮助，孙耘等校友对本文内容专门给予增补追忆，特此一并致谢！

注释：

1、蒯大富：《清华文革“五十天”》，P71，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2、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非正常死亡”现象评析》

作者简介：刘守昭，1943年生。1966届清华大学动力农机系汽车专业毕业，1967年12月毕业分配离校。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